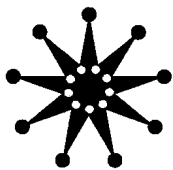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名家论丛

孙中山 与辛亥革命

张磊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
名家论丛

孙中山 与辛亥革命

张磊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张磊自选集/张磊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161-0163-6

I. ①孙… II. ①张…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文集②辛亥革命—文集 IV. ①K827.6②K257.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6756 号

责任编辑 李 是
责任校对 刘 俊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木 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394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名家论丛》编委会

主 任 丘树宏

副主任 徐 剑 尹绪忠

成 员 周 萍 元维社 虞天识 卢曙光

《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名家论丛》的出版
得到中山市的大力支持

目 录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1)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先驱——孙中山	(21)
试论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	(46)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57)
孙中山与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86)
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104)
历史的必然 革命的需要 ——纪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60 周年	(118)
三民主义新阶段与三大政策	(128)
孙中山与黄埔建军	(156)
孙中山与 1924 年广州商团叛乱	(163)
孙中山与宋庆龄	(181)
国之瑰宝宋庆龄	(199)
论朱执信的民主革命思想	(209)
为中国民主革命献身的伟大革命家——廖仲恺	(227)
论刘师复	(231)
魏源思想刍论	(248)
洪仁玕简论	(258)
孙中山的文化取向与“理想国”	(268)
孙中山的中国近代化构想与方案	(285)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	(293)
近代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319)
戊戌维新百年祭	(326)
划时代的伟大启蒙运动	
——纪念五四运动 90 周年	(329)
五四运动与孙中山	(337)
爱国主义：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	
——纪念鸦片战争 150 周年	(340)
枷锁与觉醒	
——从《马关条约》签订百周年谈起	(345)
应当编著一部《中国近代全史》	(347)
科学地评价孙中山与革命民主派	(350)
锲而不舍 深化拓展	
——关于孙中山研究的浅见	(362)
附录	
主要学术著述目录	(369)
征引书目	(371)
后记	(381)

学术自传：我与历史科学

一 为什么选择史学研究作为终生事业

我十分赞同和经常援引恩格斯在评论托·卜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书时所作的申明：“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和轻视历史的启蒙：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重视历史。”

这是我学习和研究历史——主要是中国近代史以来，逾五十余年岁月而不渝的信念。

这种对专业的抉择和热爱，并非偶然。一方面，显然与家庭的文化氛围有关。父亲曾经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同时在大学里讲授中国报业史等课程。兄姐则酷爱文史，涉猎范围广阔。我从少年时代便阅读了不少书籍，尤其是鲁迅的著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狂人日记》中对封建旧制度的本质的犀利剖析，使我稚嫩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不仅引发了我读史的热望，也启示我立志掀翻那血腥的“人肉宴席”。对我而言，学习和研究历史一开始就是与揭露和消灭“吃人”的制度密切相关的。迄今，我的这种初衷并未改变。另一方面，数、理、化课程的荒疏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我的中学时代正值人民共和国诞生的前夜，少年生活中充满着激情、战斗和憧憬。而于1948年春在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外围“民主青年联盟”后，更成为一名“职业学生”。同年夏天，反动统治者进行着垂死的挣扎。白色恐怖使我在考入育英中学高一班后不足一月，便被迫暂时避往天津，旋于年底按组织指示潜赴解放区，在河北省泊头镇学习、待

命。翌年初，我随人民解放军重返天津并在市军管会参与接管工作。稍后，组织在干部“南下”的大潮中安排我复学，因为我时年仅16岁，即将大规模开展的建设祖国事业，必然需要大量专业人才。我接受了组织的建议，决心重新返校学习。由于对理科课程的搁置，我别无考虑地选取了历史专业——虽然，对未来的经济建设心向往之：梦想成为一个水利工程师，奔波在江河山岭之间。

1950年，我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先是本科生，后是中国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尽管运动频繁，但在北大的学习终究是极为难得的。在诸多名师的指导下，我从史学的学徒起步，逐渐入门，成为一名史学工作者。时光流逝，匆匆已过了四十余年。已逝的翦伯赞、向达、杨人梗、齐思和、邵循正、周一良、邓广铭诸师音容宛在，风范长存。健在的张芝联、田余庆等先生依然奋战于史学战线，继续给我以教诲和激励。特别是导师邵循正教授的严谨学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自己仅从诸师的道德文章中学得十之一二，确是愧对师门。

1958年秋，我毕业即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当时的所长是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杜国庠，他在各个方面都是我的楷模。我在所内从事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虽有干扰和冲击，总算不绝如缕，并在前辈学者和同事的指导、促进下得以初窥堂奥。在回溯四十余年的研究工作历程时，我必须提到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教授，他对我的长期谆谆教诲，使我作为私淑弟子受益匪浅。

忆昔二十初度，往事依然历历在目。今已年逾古稀，反思学习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不禁十分惭愧，虽然这种状况有其客观原因——在十年内乱及此前的年代中，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泰半为各种“运动”所消耗；而社会科学的春天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到来后，却又忙于事务。但是，个人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时至今日，我常常咀嚼着那个讽喻意味深长的譬例：过去牙齿很好，但没有花生米；现在花生米有了，牙齿却差不多掉光了。这不正是我和同代许多知识分子的悲剧所在吗？思之令人痛楚！

值得告慰于师友和社会的是：我十分热爱自己的专业，它不仅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无论历史科学的遭际如何，我始终确认它在社会文

明中具有重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我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历史科学，了无遗憾。如果有第二次生命，我仍将选择这门科学作为终身的事业。

二 读史使人明智

毫无疑问，历史科学承担着重任。

许多哲人曾经就此作过论述。培根的阐释十分中肯：读史使人明智。历史科学的终极任务，主要在于从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揭示出其实质和不同领域、层次的客观规律，使人们得以了然于过去，从而更为自觉地把握现在和瞻望未来。历史是人们创造的，但其主观能动性并非随心所欲，只有立足和凭借于客观的条件和因素，人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戏剧。因之，历史创造者就必须力求避免盲目性和提高自觉性，以便充分发挥其社会活动的效能，并使社会发展较为顺畅和健康。对于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正是赋予人们活动以理性的主要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们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愈益深刻、全面。历史科学的“通鉴”作用，自是越发增大。

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使得史学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令其摆脱了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主义的局限，不愧为人类认识、变革与改造社会的强大的思想武器。试以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例，它的科研成果所揭示的规律，无可置辩地表明了严峻的真理：在长达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中，无论是农民战争，还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抑或资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没能挣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拯救和发展中国，使之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经过反思和比较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才使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并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上升到富裕的、民主的、文明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能经由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两个阶段即三个阶梯。历史证明：唯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和发展中国。

历史科学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甚至成为它的主要载体。显而易见，历史科学的这个职能也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健康发育的民族，

都不可能抛却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虚无主义是有害的偏见，“全盘西化”的侈谈则无异于痴人说梦，以致曾是主要倡导者的胡适后来也不得不加以修改，用“充分世界化”的观念取代。当然，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必须有赖于对它进行科学的理解、辨识和取舍，使之具有时代精神和新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全盘肯定同样是有害的偏见。历史科学在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具有特殊的意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它的认识功能是广泛的：既综观了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又横览了社会生活的断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诸领域），阐明了事物的本质，确认了它们存在的依据和作用，从而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理解、辨识和取舍提供了科学的基础。

此外，历史科学还是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的主要手段之一。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能容忍外来的侵袭和内在的压榨，因之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绵延不绝。这个伟大的、生生不息的民族不仅敢于面对自己的命运，并且决心改变屈辱惨淡的处境。长期以来，积淀深厚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附丽于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为杰出人物的思想与实践。经由史学（它的各种形式的著述）的传播，后人得以认识、继承与发扬光辉的传统，不仅在思想上予以认同，并在情感上蒙受感化。不言而喻，熟知持续不断的、波澜壮阔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斗争史迹，读过《正气歌》、林觉民等烈士的遗书、孙中山的演说、鲁迅的杂文……必然丰富了人们的内心世界，提高了民族的综合素质。至于当代众多的共产主义者的高大形象，更是振聋发聩、发人深省、令人奋起。

以上所述，只是荦荦大端。历史科学的作用和意义，当然远不止此。随着史学研究的改革，它的多元的社会功能必将强化和发展。

三 史学改革如是观

我们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必须在自我完善中发展。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史学研究也要不断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潮流，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历史教育”被人们所重视，即是从一个方面充分表明历史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特别是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社会文明建设中的不可代替的地位。

史学研究的改革，无疑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史学理论、方法论到具体

形式，无不涵盖。但是，中心课题还是理论、方法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学风与文风，因为这个课题关乎历史科学的存废兴衰。其余问题当然也很重要，却不具有根本的意义。

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堪称历史科学的灵魂。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审查，史实的辨识、考订和确认，自然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依据，因为论断只能产生于研究过程的终端。把握了准确的、典型的充分史实，才能引出科学的结论。但是，历史科学绝非局限于史料的排比和史实的判明，它的根本任务在于阐明社会历史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的规律性，这就要求揭示现象的本质及其必然联系。因之，理论、方法论不可低估。当研究过程进入分析论述阶段，既有赖于世界观的理论指导，又离不开方法论的实际运用，简单的初级逻辑思维在这里往往显得无济于事。标榜摒弃任何理论指导和崇奉“历史客观主义”的史学家，难免沦为并不高明的哲学的俘虏。对于历史科学来说，理性是绝对必需和不可须臾背离的。

在史学研究的改革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原则。史学研究之所以成为科学，关键在于它拥有科学的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迄今仍是研究历史的正确指南和科学手段。它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解释了历史发展的动力，指出了群众、阶级、政党与个人的相互作用，判明了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因而，对历史研究具有根本性、普遍性的指导意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研究工作的理论、方法论，正是我们的历史科学的优势所在。当然，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彻底槟除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因为这种态度和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所以，它也理所当然地戕害了历史科学。唯一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它科学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体系，必须充分吸取先前的和当代的一切科学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和丰富，永葆其生命力和活力。至于它的某些具体论断，或是已经不适合新的实际，或是在当时已不尽然，则应加以补充和更替。坚持和发展，乃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唯一科学态度和正确方法。

信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拒斥古今中外其他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方法论。这里，主要侧重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而言。对西方的历史哲学一味膜拜是盲目性的表现，因为引进过程中缺少分

辨。但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定，同样是缺乏分析的非科学态度。高墙深壑，拒斥一切，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准则，只会使自己的思想封闭和僵化。事实上，当代科学的发展，形成了一些具有科学成分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值得吸收和借鉴，尽管其中包含着杂质和水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应当是有所分析和选择的“拿来主义”，只要这种理论、方法论裨益于历史研究。况且，日趋复杂和多变的世界对历史科学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理论、方法论的更新和多元化，也就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为了有助于更为深刻和全面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必须不拘一格，吸取具有科学因素的理论、方法论的优长，为我所用。史学从封闭僵化走向改革开放，着重体现在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近年来的一些史学著作就是实例，由于它们采取了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诸多视角和比较、计量等各种方法，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显得丰富而新颖，获得各方面的好评，使过去一度盛行的某些干瘪枯燥的论著，大为减色。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史学家们应用理论、方法论的灵活态度堪资借鉴。他们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理论、方法论。甚至同一研究对象，也不排斥采用相异的理论、方法论。研究历史进程时，他们中的不少人较为侧重社会经济状况。探索个人的思想与实践时，则更多地求助于心理分析。事实上，西方的哲学不断分化、翻新和变易，一种理论、方法论的流行时间往往很短，就被另一种“新思潮”所取代。80年代中期，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曾与许多外国史学家有过较长时间的接触。其时，“新三论”已经更替了“老三论”，结构主义不再时髦，有不少学者服膺于新结构主义。他们对于一些概念的含意的理解，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有关“异化”——一度在我国理论界成为热点——的诠释就有二百余种。这种状况不足为训，但在丰富史学著作的内涵和形式方面有着积极意义。我们对于理论、方法论的认同应当更为广阔，允许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一元为主，辅以多元因素，只会使史学理论、方法论有所发展，从而促进史学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改革的进程不能中止。僵化、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必须彻底清除，沿袭已久的陈腐观念应当继续打破。但是，思想解放与实事求是不可背反，更不能有悖于科学，挣脱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桎梏，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只此而已，别无其他。不加分析地标榜“反迷信”，笼统地要求“总体反思”，甚至主张“彻底抛

弃过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论调的错误在于混淆了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把教条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因之，在反对僵化和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的同时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与此相关，也就一笔抹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的重大成绩。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理论、方法论的正确与否，绝不在于时序意义上的“新”与“旧”，而要取决于它的科学性，并需由实践加以检验。刻意求“新”地构筑起来的理论体系可能产生暂时的轰动效应，却与科学风马牛不相及。正确的理论、方法论也决不会因其“旧”，以致变成谬误。当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把握及其运用绝非易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不是生搬硬套与囫圇吞枣——一切有益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方法论的积极成果。这种过程难以一蹴而就，既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对众多的史学理论、方法论加以分析、辨识和选择，并发扬严谨、朴实的学风和文风。史学研究的革新的关键，就在于此。此外，自然还包括选题、体裁诸问题。

应当力戒赶追时髦，争逐热点，生吞活剥“新思潮”，滥造乱用怪名词，故作妄语以示高深，营造“体系”以显博大，热衷于“翻案”文章，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这些表现都是不足取的，因为这不是严肃认真的探索，与史学研究的革新无关，无须赘言。甚至一些拓展性的尝试，也因缺乏科学性走入误区，前些年曾一度为人瞩目的“三论史学”、“新三论史学”，就是可悲的例证。

把自然科学的某些新理论、方法论引入社会科学，反映了两大科学体系的趋同，丰富和改进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引进只能是有限度的、符合社会科学特点的，否则，必然会带来消极后果。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各有自身的规律和特色。历史科学以人类社会运动过程为研究对象，探索它的变化发展的规律。系统论、控制论却是从系统的“稳定性”出发，研究系统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二者之间的差异（研究对象、目的和条件）绝对不能忽视，生硬地搬用系统论、控制论去研究历史，不仅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深层之谜”，还会陷入窘困的境地。况且控制论乃至系统论在近半个世纪中虽然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但在理论上尚未成熟。它们不断向毗邻科学延伸和拓展，而来不及体系化、完善化。加以在阐发原理和方法的过程中，又受到了西方哲学流派的消极影响。可见，它们自身的特性及其

不成熟性限制了应用于社会科学的范围和效能，以致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在论及这门科学与社会科学时也得无奈地指出：“有许多东西我们只好让熟练的历史学家用不科学的、叙述的方法进行研究。”实践证明，只有在社会科学研究规定范式的制约下，自然科学的某些成果——理论、方法论，才能得以富有成效地用于一定范围内的课题。“三论史学”、“新三论史学”把自然科学理论、方法论的引进普遍化、绝对化，甚至以之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绝非新史学的发展的健康趋势，留下的教训值得反思。谓予不信，试看近年来的一些著作，如轰动效应不小的《兴盛与危机》等，当可了然。

四 资料工作也需观点指导

如何处理资料和观点，是关乎学风、文风的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原则即是资料和观点的统一，毛泽东早就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曾就这个原则作了如下阐述：“……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

毫无疑问，资料对于科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对观点而言是第一性的。不占有必要的资料，科学研究的进行应是难以想象的。正如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但是，绝不能因此而轻视理论。贬低观点的重要意义，只能给科学研究工作带来危害。科学研究的任务不在于罗列一些资料和对它们进行考据，阐明事物的规律才是它的终极目的。因此，对广泛收集和调查研究所获得的大量素材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思想工夫，以引出“概念和论理”来，乃是科学研究的决定性阶段。在认识的深化过程中，科学的理论、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是极其重要的。

然而，把观点的指导意义仅仅局限于“造成概念和论理”的阶段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事实上，占有资料的阶段也需要观点的指导。搜集资

料必须有目的和方向，否则将会在大量资料中处于盲目摸索的境地：或是钻入牛角尖，或是“如堕烟海”。同时，资料本身往往是真伪混杂的——有反映真实的，有呈现假象的；有显示本质的，有局限表面的。只有对资料进行“批判地审查”，才能为科学研究提供真实的、典型的和有价值的资料。“批判地审查”要求科学研究工作者对资料具有敏感性和明辨性，而这种敏感性和明辨性是与观点的指导分不开的（当然，版本学、训诂学、考据学等等也大有助于判明史料的真伪）。观点的指导意义，无疑是贯串包括搜集与使用资料阶段在内的全部研究过程的。

在这个问题上，我在科研中有些粗浅体会。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为索解广东地区辛亥革命运动而搜集资料。在初步的整理过程中，发现有关当时民军的资料存在着一些疑点：几乎所有文献材料和回忆录表明，数量巨大的、在全省范围内风起云涌的民军曾被认为在那个社会变革时期起了“害群之马”的作用，它的被镇压、分化和遣散是“理所当然”的。对这些资料作“审查地批判”使我产生了怀疑，因为，人民群众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必须善于透过人民群众斗争的某些落后形式而洞察其革命内容。当时广东的民军固然有着缺乏训练、人员复杂等缺点，但它终归是人民群众奋起的主要标志，并且成为促进革命形势发展的重要因素。要回答这个疑问，就必须进一步搜集有关民军问题的资料，才能为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基础。我继续注意这个方面的资料。终于从相关的史料汇编中得到关于民军的一些资料，这些出自当时革命运动领导人手笔的记述说明：民军大部分是纪律良好的；革命军政府正是依靠民军“以压迫降军与防营”（胡汉民语）。这个材料是有价值的，它不仅具有第一手的性质，而且反映了历史真实。这种经过“批判地审查”后的资料，可以从中引出科学的论断。那么，初时搜集到的有关广东民军的资料为什么会是虚假的呢？这是因为存在着鄙视人民群众的偏见，即使是一些领导了当时反清武装斗争的革命民主派成员也很难对人民群众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可见，初步搜集到手的资料是反映了某些假象和表象的，它们不够真实、典型，不能成为科研工作的可靠素材。

这个例子表明，观点对于资料工作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它能为资料工作指明方向；它能有助于对资料进行“批判地审查”。可见，为了加强和改进资料工作，也必须强调观点的指导意义。资料和观点的关系是辩证的，而观点在科学研究中处于“灵魂”和“统帅”的地位，这种作用贯

串于全部科研过程的始终，而不仅局限于“造成概念和论理”的阶段。

五 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基本观点

历史科学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自不待言。对于切近当世的中国近代史来说更是如此。这门学科的直接社会功能和强烈现实意义，使得关于它的研究工作的改革益发迫切。我之所以不揣简陋地阐明几点思考，并且兼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这个重大基本问题作为验证，用心之处，正在于此。

近十余年，确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繁荣期。成果丰硕，诸家并陈。几乎在所有重大课题上都迈出了探索的步伐，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当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不足和缺陷，并努力加以改进。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同这个历史时期的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相比，与现实生活的需求相较，无疑存在着差距。至于出现了一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观点和不足取的倾向，也是难以避免和毋庸讳言的。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

恰如其分地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研究工作，是关乎学科现状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种估计涉及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前实绩、现有水平、理论和方法论以及发展趋向。应当采取科学分析的方法，力避片面性和绝对化。笼统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都非精当的论断。对于先前的许多研究成果，不宜轻率地否定，判为“极左思潮”的产品，当做有待“彻底破除”的“旧物”。甚至妄加罪状，如指责“两半论”（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观点的简称）“延误了我们反封建历史任务的完成”，成为“时至今日反对‘封建残余’仍然是严重而艰巨的斗争任务的思想认识根源”，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作出的许多历史论断是科学的，反映了客观实际，不仅对学科的建设起过促进作用，而且产生过不容忽视的积极社会效能。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以及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各个阶级的地位与作用）的重要论断，已为民主革命的实践所验证——在这个为基本国情定性的认知基础上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纲，获致了完全的实现。因之，“两半论”是不能“彻底破除”的。至于补充、丰富和发展，自是十分必要。应当重申的是：一种观点和理论的真伪标准绝非“新”与“旧”；是否符合客观